

耄耋岁月忆华年

王东年

流年如水,岁月悠悠。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湘潭大学特聘教授吴岳添即将进入耄耋之年。回忆我们这代学子所共同经历过的青春年华,感慨系之。写下以下文字,谨以此祝贺学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的老同学八秩华诞。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这代人曾经受了三年大饥馑的体肤之饿、身之空乏,十年浩劫的所为行拂之乱,心志之苦以及两年多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筋骨之劳。所遗憾者,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未能将所学到的知识有效地报效祖国,更遑论担当大任;所幸者,我们这代人中间还是出了岳添这样出类拔萃的研究法国文学的著名学者。念此,岁月蹉跎的惆怅中平添了几多慰藉。

我是江苏省江阴县祝塘中学1962届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大饥馑的阴影还未散去,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备尝了时世的艰难,特别那些走读学生,天蒙蒙亮就要上学,中午只带些野菜充饥,春天里带几只涸涸肥田的紫云英(俗称“红花草”)菜团果腹,放学后还要帮助父母干农活,他们学习勤奋,在极其残酷的生存条件下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意志,班上没有一个同学退学。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想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生小羸弱,高中时常常发疟疾病,加上饥饿,瘦骨嶙峋。高考前拼命读书复习功课,白天看报就躲到操场东边的玉米田里看天直到天明,晚上冒着蚊虫的叮咬复习到深更半夜才上床。

那时高考科目分为理工、农医和文史三类。我自小就喜爱中文和历史,所以选的是第三类科目。报考前,老师来教室询问志愿,考生选的都是政治和中文,没有人报外语,我的英语学得不错,就选了外语专业。老师再问到学校,我觉得北京大学离家太远,往来路费昂贵,南京大学就本省,于是就选了南大。南大外文系设有英俄德法四个专业,我几乎未加考虑就报了法西语言文学专业,原因是我在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上学到过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篇文章,其中韩麦尔先生说的“法兰西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考场设在江阴县城的南菁中学,来自乡间高中的考生们各人背了条小草席和几件随身的替换衣服,走了十几里路再乘小轮船到了江阴县城。开考的日子为7月10日至7月12日,正逢江南的盛夏酷暑,考试在平房教室里进行,室外是一排梧桐树,令人烦躁的蝉声一浪高过一浪,开考进行到一半时间不到,就有几位考生晕倒后被抬出教室,此情此景,毕生难忘。

1962年是国家自1952年大学统一招生后录取人数最少的一年,当时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的困难,国家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所有高等专科学校停办,只有本科院校招生。录取率由1961年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六降到1962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当年高中毕业生44.1万人,高校招生数量仅10.7万人,不过那年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考生基本上是按成绩择优录取,录取生的考试成绩是很高的一届。

高考回家,我自以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已作好到生产队务农的思想准备。有天早晨,我正在菜园里下胡萝卜种,哥哥兴冲冲拿着从镇上路局里取到的通知书告诉我已被南大录取,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喜出望外,全家吃了黍米粉圆子加几粒糖糖以示庆祝。第二天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到祝塘中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在校老师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多名毕业生就录取了我一人,想起农村同学们读书的艰难,想起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未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1962年9月1日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南小村庄,第一次从无锡乘上火车到了南京,我背着行李走到汉口路,看到突兀在眼前雄伟高大的南大校门,内心激动不已。报到后获知,我们一届的法语专业共有30人。开学那天法语教研室任何如先生在北园南楼为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开学典礼,他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法语将来为祖国建设服务、为中文法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也就是在这座小楼里,马光璇先生给我们上了第一堂法语课。马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的外甥女,著名油画家、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吕斯百先生的夫人。她曾当过法语电台的播音员,语音纯正清晰,我们一届新生有幸一开始就受到她标准的巴黎语音的严格训练。1962和1963年为高等教育的黄金时期,我们经历了狠抓教育质量的两年,法语教研室的何如和赵俊欣等教授先后任过我们的法语老师。何先生是一代法语宗师、杰出的翻译家。他在巴黎大学攻读时,就以中国题材《贵妃怨》创作了一首法语长诗,轰动当时的法国诗坛。何先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在课堂上花许多时间讲解中法文翻译的技巧,他既注重译文的正确和流畅,又讲究文句的形式之美,还高强度训练我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期终考试的方式也很独特,用一只老式的台式录音机在课堂上放三遍由他翻译和录制的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录音,然后要我们立即用法文默写出译文的全部内容,其考试之难度令人咋舌。

岳添高高的个子,硕长的身材,他在南京浦镇读的高中,和我们纯农村来的学生相比,他的知识显然比我们宽,他识简谱,会吹口琴,会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还会骑自行车。在二年级时我和他分在同一个小班,开始他的法语成绩并不出色。到了三年级,上口语课的是李清泉先生,他常让学生复述法语课文的内容以提高听说能力,每当岳添流利复述或回答问题时,他一手拿着老花眼镜,笑眯眯地听着,边带着赞许的口吻说:“Ah, Bon, Bon!”(好,好!)在他的训练下,岳添的听说能力突飞猛进。岳添的这一能力还得到赵俊欣教授的赞赏和器重。两位老师的栽培开启了岳添大脑中的智慧之门,激发了他的学习积极性和潜在能力,从此岳添的法语成绩有了很大提高。就是凭此扎实的听和说基本功,在十年没有用法文的情况下,岳添顺利地通过了1978年研究生考试。“多亏李清泉老师的训练,我才得以考取,至今仍然感激在心,师恩不敢忘也。”李先生退休后回到上海度晚年,靠每个月一千多元菲薄的退休金过着清苦节俭的日子,却留下了“在我去世后,将全部财产全部捐赠西南山区,作为该地区贫困孩子的教育费用”的遗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南大求学的时光已成烟云消散,就我个人而言,所学习的法国语言文学和其它专业知识没有能很好地报效社会,但所学过的古今中外美好的诗文已植根于心田,他们源源不断地给我的生命注入精神营养,虽迟暮之年仍洒满明媚的春光。从这点意义上讲,此生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读书所花的心血都没有白费。我十分感谢教我们法语的老师们。正因为学了法语,我才体会到法兰西语言的美丽和严谨;正因为懂得了法语,我才接触到维克多·雨果等法国文学大师们的作品的感人和伟大。我想,这是多舛的命运对我求学时代所付出的艰辛给予的有意义的回报。

凡事只要尽力去做就好

——八十自述

吴岳添

南京大学

1962年的大学考场设在南京师范大学,就是原来的金陵女子学院。我第一次踏进大学之门,看到青砖碧瓦、雕梁画栋的大楼,惊叹不已,心想能够在这个学校里读书于愿足矣。当时政府关心考生的生活,花钱吃大米粥 unlimited,还有我最爱吃的螺丝状的咸菜,也叫大头菜。我把母亲给我做的一套新棉衣卖给了旧货店,把钱全部用在考大学的三天里,每天喝饱了粥,从凌晨三点起来看书,直到半夜都毫无倦意,心里只有人生在此一搏的狂热,为了让受苦受难的母亲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在这个关键时刻,胡莱老师慷慨地把手借给我用了三天,使我得以在考场上从容答题、稳操胜券,终于考上了南京大学。时光如水,六十多年弹指而过,但每当回想起来,我依然心存感激,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她对我的关怀。现在她已年届耄耋,我衷心祝愿她晚年幸福安康。

我以俄语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分配在法语专业。那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而中法即将建交,所以从英语和俄语的考生中挑选30人进入法语班,后来还招收了三年制的法文专科班。大学里结合文学作品学习法语,大多是法国19世纪的诗歌和短篇小说,印象最深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在课外阅读的法国小说中,第一本使我着迷、看得通宵不眠的是小仲马的《茶花女》,我对法国文学的爱好和兴趣也是由此开始的。

1968年7月,在推迟一年后我们终于毕业了。庄乐群忍痛把心爱的《外国名歌200首》,连同课本讲义一起当废纸,卖给了收废品的老头,和王东年等16位同班同学到安徽霍邱县的城西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他们两年后才分配工作,大多留在江苏各地的中学里改行教英语。只有12个人是先分配工作的,我是班上唯一出身贫农的人,因而被分配到制造飞机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在贵州安顺的兵工厂,进厂之前先到三机部管辖的江苏淮安林集6436部队军垦农场,后来又回到安徽庐江县白湖农场劳动锻炼。

“文革”的动乱岁月深深地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感情,恋人劳燕分飞,朋友反目成仇。我们毕业时彼此没有道别,没有留通讯录,也没有全班合影。从此大家各奔东西、天各一方,都经受了各种磨难。但殊途同归,2002年5月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终于约定重聚南京。30位同学中到了16人。大家回忆当年,冰释前嫌,重叙旧情,并且点燃蜡烛,在三位同学的遗像前举行了悼念仪式,其中有程树民,他被派到非洲工作,不料有一天在银行取款后被人抢劫,杀死在异国他乡。还有我的好朋友黄德新,文采飞扬的朱瑞芳,他们都因病而过早去世,令人叹息。

现在回想起大学时代,真是感慨万千。同班同学30人,都是来学习法语的。许多同学才华卓著,却由于社会的动荡和生活的磨难而不得不改行教英语或者经商,我能幸运地从事自己热爱的法国文学专业,实乃是上天的眷顾。

访加洛蒂

1986年6月,我翻译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趁此机会我在巴黎拜访了作者罗杰·加洛蒂。

加洛蒂会见过斯大林、卡斯特罗等领袖人物,与许多世界第一流的作家和艺术家有着深厚的友谊,不知道会不会乐于接待我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因此我先写信去试探一下。不料发信后第二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邀请我到他位于巴黎郊区的家里去。他已经73岁了,还亲自开车到车站来接我,没有名人的架子。

加洛蒂住在环境优美的别墅里,吃喝不愁地写作,让我这个从艰苦环境来的人颇为不解,所以我问他:“您的生活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对法国不满意?”他说他对生活并不抱怨,但是人要有信仰,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我问他是否还坚持当初的观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绝对坚持。我写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的狭隘性,因为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由于它的‘反映论’和把现实理想化,都导致了理论界对19世纪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最有名的学院派‘艺术’的颂扬。我写《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色,用马克思原有的思想来分析当代的问题,这是我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点贡献。”

他的话坦率得令人惊讶,毫无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谦虚之词。我又试探地问道:“听说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

他似乎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向我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是的,一个人自称是无神论者或者宗教信徒,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是为了金钱权力而活着,而是认为生活有一种超出金钱和权力的意义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人,而所有宗教的根源是共同的,只有像加缪那样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毫无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我被法共开除了,但是我根本的信念并未改变。我是附属于上帝的,我所说的上帝不是指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人,而是指绝对价值,同时每个人要对其他人的命运负责,任何社会如果忽视了这两点就必然要崩溃。无论是苏联的变化还是西方的现实都使我感到失望。教会也好,政党也好,宗教和政治领袖们都醉心于权力,把手段当成目的,陷于仪式和教条,因此理想的世界只存在于千千万万有信仰的人的心中。”

他的话充满了感情,毫无做作的意味,我相信他的信念是真诚的。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一下他的著作在出版了二十多年后被译成中文的原因,他严肃地表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我对毛泽东一向很尊敬。伟人也会犯错误,拿破仑后来成了一个暴君,但他仍然是法国历史上的伟人。”

我把《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中译本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说这是他的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现在中国也出了我的书,中国有十亿人,读者一定会更多。”他还把刚出版的《二十世纪的传记——罗杰·加洛蒂的哲学遗嘱》(1985)等著作送给我,希望我把它们译成中文。

加洛蒂说:“当年我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就如同现在我和您坐在一起一样。”他的话把我吓得赶紧挪动了一下身子。他谈到当年和斯大林面对面谈话等细节,使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录音机把我们的谈话保存下来,也没有手机拍摄当时的场景。

访问结束的时候,加洛蒂向我展示了一幅他最珍爱的名画,这幅画放在一个房间的中央,他按动开关,灯光衬托出手持长矛盾牌、骑在瘦马上的堂吉珂德的形象。在他送我的书里,有一本是1975年出版的《人类的诺言》,就是以这幅画为封面的。

加洛蒂终生奋斗不息,其实就是一个当代的堂吉珂德。我在访问后写了一篇《堂吉珂德的斗士——访法国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发表在1987年3月19日的《文艺报》上。

几年之后,加洛蒂又给我寄来了刚出版的回忆录《我孤独的世纪历程》(1989),并且在扉页上题词:“赠吴岳添先生,兄弟般的罗杰·加洛蒂。”我在感动之余颇为惶恐,因为他一直把我记在心里,而我虽然蒙他亲口授权翻译他的著作,但是与回国后忙于杂务,加上国内出版界的变化等原因,一直未能实现诺言。

现要继续翻译他的作品的诺言。我回国后和加洛蒂很少联系,只知道他还在写作。可以告慰加洛蒂先生的是,他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在我国几次再版,直到2019年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了“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说明他的著作仍然受到欢迎。人们对他的经历和观点可以见仁见智,但在在我看来,一个90多岁的老人还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本身就足以令人敬仰。

和安妮·埃尔诺的友谊

2022年10月6日晚上,好友们应约来我家小聚,我的手机忽然不断响起铃声。都是记者打来的,问我是否翻译过《悠悠岁月》。我说为什么问我呀,原来是小说的作者安妮·埃尔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天开始就忙个不停——做视频录像和视频座谈会,在湘大图书馆和其他学者对话。出版社为埃尔诺的获奖紧急加印10万册《悠悠岁月》,以后又多次加印,并且赠送我100册作为表彰或感谢。12月3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分会在湘潭大学举办线上青年论坛,我致了闭幕词。

2009年翻译的这本小说,在13年后竟如此轰动,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可见凡事只要尽力去做就好,该有的自然会有,没有的不用去争,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这个道理吧。到我这个年龄,名利早该置之度外了。

我为2009年访问法国时未能见到埃尔诺感到非常遗憾,所以2023年11月到欧洲游玩并出席凤凰书店的新书发布会时,我特地带上了一样书和一幅精美的湘绣准备送给她,但我们仍然没有见上面。后来我才知道埃尔诺因身患癌症,膝盖等处动了两次手术,行动不便,所以从来不接受陌生人的电话,一切事务都要通过她的经纪人代为联系,为此我特地委托子吴严在可能的情况下代我去拜访她,并且去我为她制作的自我介绍的短视频。

2024年5月26日,正值法国的母亲节,吴严经过联系,带着玫瑰花到巴黎郊区的塞尔日拜访了安妮·埃尔诺。吴严给她看了我的视频,把我的译作《悠悠岁月》送给了她,扉页上有我的题词和邮箱。埃尔诺非常喜欢和感动,特地把湘绣挂在她卧室床头的墙上。

埃尔诺送给我和吴严的书是加里玛出版社新版的《悠悠岁月》。她给我的题词是:“题献给您,吴岳添,无比感谢您的译作把这些既是法国的也几乎是世界的岁月带到了中国。”给吴严的题词是:“感谢您友好地到塞尔日来看我,带来的珍贵礼物和您父亲感人的话语。”

吴严请埃尔诺到玫瑰岩饭店共进午餐,这是个著名的饭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也曾在这里用餐。

我平时用微信,很少打开邮箱。6月3日打开邮箱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埃尔诺在5月30日给我来了一封信:

亲爱的吴岳添,您的礼物使我极为感动,我已经挂在卧室里,以便醒来时就能看到这朵精美而又华贵的花——是一朵菊花?在您的录制像里看到您和倾听您的声音,我感到非常快乐。您的儿子吴严,是一位卓越的信使,在Jie Xu和朋友们陪同下,他在一家极好的餐厅里用中餐款待了我。我希望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我也希望在法国、也许在中国见到您。

非常友好的安妮·埃尔诺于塞尔日,2024年5月30日

我当然赶紧给她回信:

亲爱的埃尔诺夫人,请原谅我的复信有点迟了,因为这几天我去了广西,到广西民族大学做了一个关于翻译的讲座,附上的几张图片就是关于您最近的信息。

我回到湖南湘潭后极为感动地收到了您热情的来信。吴严告诉我您现在每天都在写作,您确实是我生活和学习的楷模。我希望我们两人都身体健康,都有幸福的生活。

我送您的画是湖南的湘绣,上面的花朵是荷花,中国人欣赏荷花,因为它在污泥中生长却依然清洁,始终保持着高贵和典雅,我以为这正是您的性格和象征。

欢迎您有空的时候来信,我也会及时向您传达有关的信息。也希望能有机会见面相聚。

非常友好的吴岳添,2024年6月3日

没有想到她收到之后立刻就接连给我两次回复:

您的信息对于我非常珍贵,我也很高兴地得知您在关于翻译的讲座中谈到了《悠悠岁月》。我欣赏您的活力,现在在我难于旅行,对于向公众讲话也不再同样的热情了。

谢谢!荷花,它比菊花更美,而荷花尤其是爱情和幸福的象征。

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她在奥运会之前感染了再次流行的新冠,幸好已完全康复。8月初我去信问候,她正和儿子戴维全家一起在外地度假。从此她在给我的信末都署名安妮,也就是把我当成了亲人和知交。我衷心祝愿她健康长寿,并期待着今后能有机会和她相见。

埃尔诺在获奖演说中表示“我没有把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我个人的胜利。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的非正义而斗争”。她身体力行,始终关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命运,毕生都在为维护女性的权益而奋斗。现在她虽然已经84岁高龄,但仍然坚持每天写作四个小时,真正称得上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值得后人永远景仰。

胜似桃花仙

2023年3月6日,《文艺报》发表了的文章《我的翻译之路》,可以说是我翻译生涯的小结。我回顾了从事翻译的历程和甘苦,认为严复所说的“信”与傅雷提倡的“神似”并不矛盾,要靠译者自己体会和把握。我把这篇文章发到朋友圈里,还意犹未尽地附上了一首打油诗:

弹指一挥间,匆匆数十年。译路多崎岖,攀援若等闲。人生多磨难,唯有勇向前。晚岁居湘潭,胜似桃花仙。桃花仙出自唐伯虎的《桃花庵歌》。我欣赏他作为桃花仙人“不愿鞠躬车马前”的骨气,但是不认同他天天醉酒,“但愿老死花酒间”的心态,人总还是要老有所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才说“胜似桃花仙”。

“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QR code

跑马厅四路大检阅 (素描) 张乐平、赵延年 选自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一幅画像的背后故事——杨可扬与赵延年纪念特展”。1950年10月1日,杨可扬、赵延年等以美术记者身份接受上海70万群众国庆大游行速写任务。

